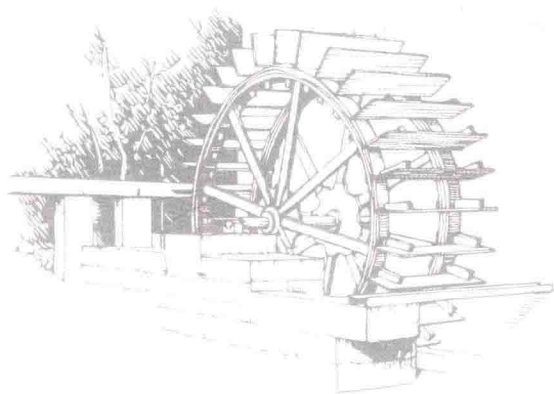


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译丛

SUPPLY - SIDE ECONOMICS

A Critical Appraisal



供给经济学 经典评读

理查德·H. 芬克 (Richard H. Fink) 编

沈国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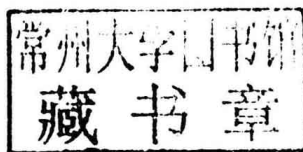
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译丛

供给经济学经典评读

Supply-side Economics: A Critical Appraisal

理查德·H. 芬克 (Richard H. Fink) 编

沈国华 译



本书为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供给经济学经典评读/(美)理查德·H.芬克(Richard H.Fink)编;沈国华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1

(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译丛)

书名原文:Supply-side Economics: A Critical Appraisal

ISBN 978-7-5642-2756-2/F·2756

I.①供… II.①理… ②沈… III.①供应学派-研究 IV.①F091.3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5691号

☐ 策 划 黄 磊 陈 喆
☐ 责任编辑 李宇彤
☐ 封面设计 杨雪婷

GONGJI JINGJIXUE JINGDIAN PINGDU
供 给 经 济 学 经 典 评 读

理查德·H. 芬克 编
(Richard H. Fink)

沈国华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 邮编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710mm×1000mm 1/16 30.5印张(插页:1) 548千字

印数:0 001—3 000 定价:72.00元

图字:09-2016-241 号

Supply-Side Economics :A Critical Appraisal

Richard H. Fink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Supply-Side Economics :A Critical Appraisal*, by Richard H. Fink,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aeger,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1982 by Richard H. Fink.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CLIO, LLC.

2018 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总 序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并成功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列。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改革的不全面、不彻底、不及时,也逐步累积了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与需求端的“错配”已非个案,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为此,2015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央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其内容也在不断发展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顾名思义就是要从经济结构的供给端着手,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无效供给过剩,而优质供给不足,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以及补短板这些结果导向的具体目标出发,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瓶颈”。

当然,除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还面临体制结构的失衡和治理结构的失衡。这三个失衡层层递进,经济结构的失衡是表象,体制结构的失衡是深层原因,治理结构的失衡是内在根源。这三个失衡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经济还将会随着政策的松紧而不停上下波动,形成过去几十年来反复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因此,改革的目的是要矫正这三个结构性失衡,通过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想要顺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会涉及许多

重要方面,例如:产能利用率的调节,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要素配置扭曲的矫正,简政放权、减税降成本的具体落实,等等。显然,这是一项规模庞大且各环节关系错综复杂的系统性改革工程,另外,还必然会与经济增长、通胀水平、贸易差额、就业情况以及社会稳定等硬指标存在密切联系。在这一背景下,从理论角度,便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成熟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从实践角度,也需要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借鉴,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存在其阶段性与规律性,而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是其主旋律。供给经济学正是针对这一矛盾,从供给侧入手,系统阐述经济失衡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的西方重要经济学流派。作为20世纪70年代初才于美国出现的经济学“少壮派”,却已经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大显身手,为其摆脱经济发展困境、重新注入发展动力,实现当时这些国家经济的二次腾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供给经济学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当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而传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失灵时,自然会促使有社会担当的经济学家、知识精英去重新审视问题的本质,探索全新的解决手段,其中就不乏阿瑟·拉弗、万尼斯基、马丁·费尔德斯坦等代表性人物,也形成了一批诸如“拉弗曲线”的经典思想。

供给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1)经济失衡的原因在于产能利用率与有效供给不足,且两者的提升并不会造成通胀、阻碍经济发展;(2)应采取特定的减税政策,降低经济部门与劳动者的生产经营与纳税成本,为其注入经济活力;(3)应减少政府干预,即简政放权,促进自由市场竞争;(4)萨伊定律,即供给能自行创造需求是有效的,仍应注重对经济的供给端调节。如此看来,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供给经济学无疑能为我国此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此次精心筹划推出的“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译丛”,准确把握住了中央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需求,精准对接了中央顶层设计在学术层面的要求。

此套译丛包含6本供给经济学派代表性学者的重要著作:其一,对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完整介绍,并注重阐述其思想要点;其二,回顾了一些发达国家的供给侧改革进程及曾面临的问题,以借鉴其宝贵经验;其三,以专题形式对供给侧改革中的关键抓手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深入探讨;其四,鉴于此轮改

革中金融资本供给端的重要性,专选著作对此方面进行了分析。

《供给经济学经典评读》系统介绍了西方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理论基础及关键要义,很好地填补了国内系统了解学习供给经济学派方面的空白。同时,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其深入分析了美国和英国当时非常重要的供给侧改革事件,可以说,能很好地兼顾研究供给侧改革的读者在理论完善和案例研究方面的需要。在供给侧改革理论方面,本书开宗明义指出,供给侧改革需要对凯恩斯经济学模型做出修正,讨论了拉弗曲线模型的意义与适用性,以及如何在供给经济学中借助不断发展的计量经济学进行分析等一些需要明确的理论基础;在案例研究方面,书中探讨了美国总统里根为推行供给侧改革所施行的经济改革项目,供给经济学思想演化的完整脉络,以及什么才是真正合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本书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不仅充分涵盖了供给经济学的全部重要理论,而且很好地将其与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事件结合起来,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并重。

1982年4月,在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也颇为著名的供给侧改革会议。《欧美经济学家论供给侧——20世纪80年代供给侧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纪要》一书就是将当时会议中具有代表性的演讲文章按照一定顺序集结成册,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供给侧改革方面的学术研究资料。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士中不乏经济学界泰斗,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托马斯·萨金特、詹姆斯·布坎南等,也有美国当时的政界要员,如杰克·肯普、马丁·费尔德斯坦等。就本书内容的重要性而言,完全可以作为研究供给经济学的高级读物,甚至有媒体评论认为,应作为研究供给侧改革的首选读物。书中内容反映了在美国着力解决供给侧改革问题的过程中,经济学界顶尖大师的真知灼见。

《货币政策、税收与国际投资策略》是供给经济学派代表性学者阿瑟·拉弗与维克托·坎托的一部研究供给侧改革政策理论基础与实践效果的核心力作,通过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国际经济问题以及国际投资策略以专题形式进行深度讨论,重点阐述了刺激性政策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如何影响经济表现;同时,书中探索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体系,帮助读者厘清政府政策在经济中的传导路径。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货币政策制定目标和通货膨胀相关话题;第二部分聚焦于对供给侧经济学的运用,分析了政府施加的经济刺激和约束性政策的影响;第三部分遴选了一些国际经济方面的热点话题,如贸易收支情况与汇率表现,展示了从供给侧视角进行分析所能得出的结论;第四部分着重讨论了资本资产税收敏感性投资策略,以考察供给侧经济学思想可以为微观投资者带来的优势。

减税,是供给经济学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州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税收、能源和劳动者自由怎样改变一切》阐述了为什么在美国州一级减免税负会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财富创造。书中对税收改革的思路进行了充分讨论,揭示了即使是美国一些人口很少的州也能从正确的政策中获益颇丰。以拉弗为首的多名经济学家评估了美国各州和当地政府施行的政策对于各州相应经济表现和美国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以翔实的经济数据分析作为支撑。另外,对美国的所得税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考察,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表现以及由于不合理的税收政策所导致的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局面等话题;同时,采取了细致的量化分析,探讨了对于国家和个人金融保障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982年,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爆发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供给侧的故事》从供给侧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回顾分析。当时,许多经济分析师都着重于研究债务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缺陷,以及世界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冲击,很少有将研究重点放在危机蔓延过程中该地区的主要债权人——私人银行——上面。作者罗伯特·德夫林则对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事件采取了后一种研究视角,基于丰富的经济数据资料,指出银行其实才是地区债务循环中不稳定的内生因素,当该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蓬勃发展时,银行会存在过度扩张问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当经济衰退时,银行会采取过度紧缩措施,造成釜底抽薪的后果。本书的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资本市场供给侧状态及调节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性,所提出的稳定银行体系的措施具有现实性启发意义。

《供给侧投资组合策略》是阿瑟·拉弗与维克托·坎托基于供给经济学思想,阐述微观投资者该如何构建投资组合的一本专著。书中每一章会分别详细探讨一种投资组合策略,并检验其历史表现情况。具体的讨论主题包括:如何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投资小盘股、房地产等标的,对股票市场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会造成的影响,以及美国各州的竞争环境等。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明确指出了采取刺激性政策的重要性。书中的分析配备了大量图表数据资料,能帮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基于供给经济学理论构建投资组合的效果。

中央领导同志已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我国当前阶段要重点实现的目标。同时也应理性认识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和借鉴。供给经济学虽形成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当然基于不同

的国情、国体,在了解学习其思想时,须持比较、思辨的态度;但是综合上述分析,显然供给经济学的诞生背景、力求解决的问题和政策主张,与我国经济发展在新形势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政策方向有相当的契合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发展阶段性与规律性的客观要求。

我们期待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此套“西方供给侧经济学译丛”,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能够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并有助于我国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伟大的目标。

是为序。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院长

致 谢

本书的编者谨向以下提供慷慨合作的学者表示感谢：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允许我们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 no. 52, Summer 1978, pp. 20—33)中把他的“论凯恩斯模型的失灵”收入本文集。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允许我们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从《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1, chapter 4)中把他的“供给侧”(The Supply Side)收入本文集。

罗伯特·L. 海尔布鲁诺(Robert L. Heilbroner)允许我们在征得作者本人和出版商同意后,从《纽约图书评论》(*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28, June 11, 1981, pp. 37—41)中把他的“对供给侧的需求”(The Demand for the Supply-Side)收入本文集。

罗伯特·E. 凯勒赫(Robert E. Keleher)和威廉·P. 奥热霍夫斯基(William P. Orzechowski)的《供给侧财政政策:对一种复兴思想的历史分析》(*Supply-Side Fiscal Policy: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 Rejuvenated Idea*)代表了本书两位作者的观点,但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观点。

阿瑟·B. 拉弗(Arthur B. Laffer)允许我们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从《卡托杂志》(*The Cato Journal*, vol. 1, Spring 1981, pp. 1—21)中把他的“政府的苛捐杂税与收入不足”(Government Exaction and Revenue Deficiencies)收入本文集。

马克斯·莫斯泽(Max Moszer)允许我们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从《卡托杂志》(*The Cato Journal*, vol. 1, Spring 1981, pp. 23—24)中把他的“拉弗模型评论”收入本文集。

戴维·C. 亨德森(David C. Henderson)允许我们在征得作者本人和出版商同意后从《卡托杂志》(*The Cato Journal*, vol. 1, Spring 1981, pp. 45—52)转载

他的“拉弗曲线为减税辩护所暴露的不足”(Limitations of the Laffer Curve as a Justification for Tax Cuts)。

布鲁斯·R. 巴特利特(Bruce R. Bartlett)允许我们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从《里根经济学:供给经济学在行动》(Reaganomics: Supply-Side Economics in Action)(Westport, CT: Arlington House, 1981, chapter 10)中把他的“肯尼迪减税”(Kennedy Tax Cuts)收入本文集。

约翰·伯顿(John Burton)允许我们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从《劳工研究杂志》(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1981)中把他的“撒切尔实验:一曲挽歌?”(The Thatcher Experiment: A Requiem?)收入本文集。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允许我们在征得作者本人和出版商同意后从《经济学评论》(Economics Review, April 1981)中把他的“里根经济计划:供给侧、预算与通货膨胀”(The Reagan Economics Plan: Supply Side, Budget, and Inflation)收入本文集。

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允许我们在征得作者和出版商同意后从《经济学评论》(Economic Review, April 1981)中把他的“里根经济计划讨论”(The Reagan Economic Plan: A Discussion)收入本文集。

莱斯特·C. 瑟罗(Lester C. Thurow)允许我们在征得作者本人和出版商同意后从《零和社会》(The Zero-Sum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0, chapter 4)中把他的“经济低增长”(Slow Economic Growth)收入本文集。

詹姆斯·C. 罗伯茨(James C. Roberts)允许我们在征得出版商同意后从《人事》(Human Events, May 23, 1981)中把他的“关于恢复金本位的主张:刘易斯·勒曼访谈录”(The Case for a Return to the Gold Standard: An Interview with Lewis Lehrman)收入本文集。

本书编者还要感谢本书的全体作者慷慨贡献了自己的文稿,并且耐心地等待本书的出版。

本书编者还要以个人名义更多地感谢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的伦道夫·波姆(Randolph Boehm)为提高本书引言的可读性,加注补充说明、校对清样和完成其他许许多多琐碎的工作提供了几乎无私的帮助,美国国会联席经济委员会的布鲁斯·R. 巴特利特在决定哪些论文入选本书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帕蒂·弗林(Patti Flynn)出色地完成了研究助理工作,还有桑迪·洛尔(Sandy Lore)和珍妮·威廉森(Jane Williamson)自始至终负责本项目的组织工作。本编者还要向乔治梅森大学芬威克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本项目开辟了专门的工作室。

作者简介

布鲁斯·R. 巴特利特(Bruce R. Bartlett)是美国国会(参议院)联席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里根经济学:供给经济学在行动”的作者。

约翰·伯顿(John Burton)是英国伯明翰大学产业经济学与企业研究系讲师,他是很多专著和论文的作者,其中包括《特洛伊木马:英国政坛的工会力量(Trojan Horse: Union Power in British Politics)》。

泰勒·考恩(Tyler Cowen)是乔治梅森大学费尔法克斯市场过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是哈佛大学沃伯格讲席经济学教授、数据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 Inc.)总裁。他发表过不少著述,包括《公共财政与大萧条》(*Public Finance and The Great Recession*),还曾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迈克尔·K. 埃文斯(Michael K. Evans)是埃文斯经济分析公司(Evans Economics Inc.)总裁,著有《宏观经济活动:理论、预测和控制》(*Macroeconomics Activity: Theory, Forecasting, and Control*)等专著。

理查德·H. 芬克(Richard H. Fink)是乔治梅森大学费尔法克斯市场过程研究中心主任和经济学助理教授。

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著有多部社会哲学专著,包括《财富、贫困与性自杀》(*Wealth and Poverty and Sexual Suicide*)。吉尔德先生还是曼哈顿研究所计划主持人。

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胡佛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曾是里根政府过渡团队成员。

托马斯·W. 黑兹利特(Thomas W. Hazlett)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尔

顿分校的经济学讲师,已经在多家大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并且给曼哈顿研究所买下的广播节目“经济展望”当评论员。

罗伯特·L. 海尔布鲁诺(Robert L. Heilbroner)是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讲席经济学教授,已经出版了10多部专著,其中包括《世俗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s*)、《美国资本主义的极限》(*Limits of American Capitalism*)和《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Marxism: For and Against*)。

沃尔特·W. 海勒(Walter W. Heller)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莱金茨(Regents)讲席经济学教授。他是一个多产作者,著有《政治经济学的新维度》(*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和《经济:古神话和新现实》(*The Economy: Old Myths and New Realities*)。海勒教授曾在1961~1964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

戴维·C. 亨德森(David C. Henderson)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专职经济学家。

曼纽尔·H. 约翰逊(Manuel H. Johnson)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现已获得美国财政部经济政策助理国务卿一职的提名,并与人合著出版了《联邦政府增长与劳动关系管制解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ederal Government Growth and Deregulating Labor Relations*)。

斯坦利·凯斯(Stanley Kaish)是新泽西州新布朗斯威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经济系主任、国际商业周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微观经济学:逻辑、工具和分析》(*Microeconomics: Logic, Tools, and Analysis*)一书。

罗伯特·E. 凯勒赫(Robert E. Keleher)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资深金融经济学家,与威廉·P. 奥热霍夫斯基(William P. Orzechowski)合著出版了《供给经济学与里根政府的遭遇》(*Supply-Side Economics and the Reagan Experience*)(即将出版)。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聘经济学教授、沃顿计量经济预测公司董事长。克莱因教授是《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一书的作者,并且担任过卡特总统经济工作小组协调员。

阿瑟·B. 拉弗(Arthur B. Laffer)是南加州大学查尔斯·B. 桑顿(Charles B. Thornton)讲席企业经济学教授。他是《私人短期资本流量》(*Private Short-Term Capital Flows*)一书的作者,并且还与人合著出版了《抗税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Tax Revolt*)。

刘易斯·勒曼(Lewis Lehrman)是来爱德合作公司(Rite-Aid Cooperation)董事长和勒曼研究所(Lehrman Institute)总裁。

马克斯·莫斯泽(Max Moszer)是里士满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

威廉·P. 奥热霍夫斯基(William P. Orzechowski)是乔治梅森大学(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经济学助理教授,与罗伯特·E. 凯勒赫合著出版了《供给经济学与里根政府的遭遇》。

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在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持威廉·E. 西蒙政治经济学讲席。他在里根政府执政的第一年担任过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助理国务卿,作为美国参议院专职经济学家是《肯普—罗斯减税法案》(Kemp-Roth Tax-cut Bill)的总设计师。他著有《异化与苏维埃经济》(*Alienation and Soviet Economy*)和《马克思的汇兑、异化和危机理论》(*Marx's Theory of Exchange, Alienation, and Crisis*)。

约瑟夫·萨勒诺(Joseph Salerno)是新泽西州新布朗斯威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经济学助理教授。

莱斯特·C. 瑟罗(Lester C. Thurow)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与管理学教授,著有《人力资本投资、不公平的产生与零和社会》(*Investing in Human Capital, Generating Inequality, and The Zero-Sum Society*)等著作。他还是《洛杉矶时报》和《新闻周刊》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斯特林(Sterling)讲席经济学教授,著有《资产积累、经济活动与年仅10岁的新经济学》(*Asset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等著作。托宾教授在1961~1962年间曾在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

诺曼·B. 图雷(Norman B. Turé)曾任负责税收和经济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他还担任过税收经济学研究所所长,1955~1961年曾任美国国会联席经济委员会专职经济学家,还是尼克松总统税收工作小组成员。

引言

理查德·H.芬克

有关经济政策的辩论往往会呈现偏离基本问题的倾向,参加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既会激化争论又会掩盖问题本质的论战。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源自我们对很多经济决策固有的潜在重要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的关切。特别是在经济政策备选方案的执行方法和结果这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时,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狂妄就会作祟。由于这样的赌注可能涉及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因此,经济政策辩论有时会蜕化为辩论双方对对方动机和人品的攻击就不应该令读者感到意外了。里根政府在过去10年里提出的全部经济政策提案(更不用说议会和学术先例)显然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引发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的物质焦虑和知识傲慢。目前的这场辩论由于涉及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重要利益关系,因此,已经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一种言不由衷、情绪冲动、意义模糊的趋势。

本书旨在方便读者了解这场辩论中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虽然无法完全阻止论战的继续(只要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论战毕竟还是有益的),但在这本集子中主要检视“供给经济学”最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应该从思想层面而不是情绪层面来进行政策评价。考虑到问题涉及实际利害关系,本集子的编者觉得,在以某种方式坚定我们的立场之前,第一重要的即使不是解决全部的问题,但至少应该阐明理论基础。

同样,考虑到这场辩论包含重要的意识形态维度这一事实——即使就其比较抽象的理论影响而言,本选集相当全面地介绍了各不同经济学派的不同观点。虽然本集子全书或者每一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衡,但是,读者看完本文集以后,对各种质疑供给侧经济政策效果并争相提出补救方法的观点,应该不难留下相当好的印象。虽然有内容广泛的备选方案可供选择,但本书所展现的与其说是供给经济学批评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不如说是(无论基于什么视角

的)供给经济学批评与供给经济学本身之间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那么,如何来夯实美国现政府备受抨击的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呢?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3篇早已成文的支持供给经济学的佳作。可能再也没有比保罗·克雷格·罗伯茨的《论凯恩斯模型的失灵》更加适合作为我们这本集子开篇之作的文章了,因为罗伯茨的《论凯恩斯模型的失灵》显然已经成为基于当代宏观经济学主流理论的现代供给学派的开山之作。罗伯茨先生是肯普—罗斯减税计划的主要设计师,而且他的美国参议院专职经济学家的身份增强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罗伯茨的这篇文章很可能是我们这本供给经济学文集中最重要的力作。

罗伯茨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凯恩斯经济学所运用的总量分析忽视了个体在回应政府影响经济主体私利的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决策作用。此外,他还表示,现在的税收结构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忽视对个人决策特别是工作、储蓄和投资决策影响的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例子。于是就出现了以下这个被罗伯茨认为是过去10年阻碍美国生产率提高罪魁祸首的悖论:由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仅仅根据对总需求的影响来看待减税或增税问题,因此常常强调减税方案中能够感觉到的通胀因素,但忽视了税负只增不减会抑制个人和企业的储蓄、投资,从而阻碍总供给的增加。罗伯茨建议运用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而不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来考察高边际税率的影响效应。他认为,如果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家视角来看而是从个人的视角来看,那么降低边际税率非但不会导致业已加剧的通胀进一步恶化,而且还能固定不变地强化美国人寻求摆脱滞胀方式的积极性。

乔治·吉尔德延续了罗伯茨的思路。在他的畅销书《财富与贫困》的一篇文章摘中重点强调了企业家个人的作用,并且阐明了萨伊定律蕴含的经典供给侧概念——一个与凯恩斯主义政策制定者们崇尚的需求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格格不入的概念——复兴的原因。吉尔德坚持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明确无误地证明了只有生产商、企业家,总而言之,只有“供给者”才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言下之意,主流经济学倡导的需求取向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那些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诺曼·B. 图雷直到最近还是里根政府财政部负责税收与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被收入本集子的文章里更加详细地进行了支持供给学派主张的理论分析。他基于罗伯茨提出的观点指出: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现实——而且对美国经济表现不佳负有部分责任;与那些放眼总量影响的个体相比,现实中的个体对政策变化更加敏感。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税收分析是围绕税收的总收

入效应这个概念展开讨论的。图雷建议运用一个用价格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影响的新古典学派框架来进行税收研究,或者更加确切地说,研究在那些由于税收导致的边际成本而准备或者不愿储蓄、工作或者投资的个体看来边际税率如何影响储蓄、工作和投资等的相对价格。他表示,从供给侧的价格效应看,税收政策可用来处理很多传统上认为对税收中性的经济政策问题。

很多的这类经济政策问题无论是否已经明确提出,都贯穿本书第一章所介绍的供给学派立场。虽然本书后面各章都深入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本书第二章展示了涉及面很大的不同的可能出发点。沃尔特·W. 海勒从凯恩斯学派的视角提出了问题,罗伯特·L. 海尔布鲁诺具体提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反对意见,而托马斯·W. 黑兹利特从基于奥地利学派洞见的虔诚自由市场立场出发对吉尔德在《财富与贫困》一书中表达的观点做出了回应。海勒关于里根政府奉行的供给学派主张的税收政策与其在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方面的货币主义倾向相冲突的警告,也是一个在本书以后章节中受到更多关注的问题。

从罗伯特·L. 海尔布鲁诺的角度看,即使供给侧方面的发明真能像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美国人也只能是跳出油锅又落入火坑。供给学派的一个共同假设就是:资本主义这台机车一旦调试好就能满负荷运转,坐在美国经济这趟列车上的全体乘客就能相对比较平稳地驶向繁荣昌盛。供给学派认为,摆脱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以后,市场系统就是一种内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吉尔德论点中存在一个有争议的元素,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合作甚至利他的美德密不可分。在海尔布鲁诺看来,不受干扰的市场经济由于明显秉承了一种源自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的传统,因此是一种内在不稳定、容易发生危机的社会结构。政府干预在供给学派看来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因素,而在海尔布鲁诺的眼里只是一种凭借一己之力防止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分崩离析的作用微妙的约束。鉴于他们各自观点的前提大相径庭,因此,海尔布鲁诺建议,马克思主义者与供给学派之间的辩论必须停留在较为基础的哲学层面,而不应该上升到政策分析或者当代经济学理论可能会允许的层面。

托马斯·W. 黑兹利特正是从海尔布鲁诺所定义的可能出发点谱系的另一端出发,指责供给学派在尊重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思想家预想的市场过程“自发秩序”方面还做得非常不够。与海尔布鲁诺不同,黑兹利特觉得奥地利学派与供给学派分析方法之间有着充分的共同基础,因此可以运用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来关注供给学派理论的某些技术经济影响。他认为,供